

千年变局下的世路与心路

QIANNIANBIANJUXIADESHILUYUXINLU

士与鸦片战争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鸦片战争是划开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标志。中国从此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说，这是一个痛苦和沉沦的过程，从历史机遇看，这恰恰又是中国由封闭走向世界的契机。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重大转折关口的中国士大夫们有何表现？他们对之作出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思想界？何以他们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主张在战后不能形成社会思潮？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需求反映了传统价值判断在与西方文化的最初交汇中表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问题似乎很难通过研究个别思想家得以解决，所以我换一个角度，把鸦片战争时期的士大夫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

士大夫一词，在中国的典籍里是个双义词。它既可以泛指一般的士子，也可以专指担任政府公职的官僚阶层。由于科举制度实行后，官僚一般都由科举入仕的士子担任；官员退休回籍后又以乡绅的身份出现，所以士大夫一词至少包括着入仕前为士，入仕后为官，退休后为绅这三种情况的人在内。

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 与中国士大夫

(一)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作为全社会智识程度最高，而且标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们，对这场战争的思想准备是很不足的。从现存的史料中，我们看不到谁曾经发出过英国将会对中国采取战争行动的警告，只有包世臣是个例外。他在 1828 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对英国侵占新加坡的后果产生过忧虑，指出：“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他警告说：“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1〕但那只是从周边国家受害中作出的一种趋势性判断，它在可能性中寄寓的必然性根本未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即使是身处禁烟第一线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已经开始了解夷情的工作后，对英国的侵略野心和实际打击能力的估计也是不足的。1839 年 9 月，他向皇帝报告自己的观察结论时说：“臣等细察夷情，略窥底蕴，知彼万不敢以欺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认为即使义律私约夷埠兵船在粤洋游弋，也只是虚张声势。对付之法，只需“严防各口，总不与之接仗，一面断其薪水，使之坐困，至偏僻港口，该夷大艘断不能行，而舢板小船应须防其阑入”。〔2〕1840 年 2 月，林则徐接得英船 12 艘将开抵广东洋面的禀报时，不仅斥之为“谎言”，而且认为“即使果有其事，而夷兵远来，粮饷军火安能持久？

〔1〕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安吴四种》第 35 卷。

〔2〕 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 677、678 页。

我天朝水陆劲旅,以逸待劳,岂不能制其死命?”^{〔1〕}自大之词,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无知,而是鄙视对手的心态。这种心态恰恰是久受“以夏变夷”传统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们的普遍心理。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战前中国人对西方的闭塞与无知,往往忽略了造成闭塞无知的文化心态的考察。英国在战前对中国虽有了了解,但知之不多,正因为如此,为了实现蓄谋已久的侵华目标,它才迫不及待地利用在华鸦片贩子收集中国的情报并定期与对华贸易有密切关系的国内大商人接触,以获得对中国国情和民情的了解。中国则相反,在‘天朝自大’的盲目优越感支配下,不仅产生不出迫切了解对手的求知欲,而且实行自我封闭的闭关锁国政策,做着自圆自足的田园梦。明乎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中英之间的交往少说也有一个半世纪之久(从康熙二十四年开关贸易算起),为什么中国士大夫会不愿去了解这个已经成为“海上霸王”并正在不断侵占亚洲古老国家和地区的‘红毛夷’;更会对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相等人在反侵略斗争中冲破传统文化心态和价值判断的压力,主张了解和学习西方,在文化史上是何等有意义了。

传统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在士大夫中以政府官员的言论为最多,也最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这一群体中最有资格向朝廷上奏进言的阶层,他们的奏章为查考他们的思想言论留下了直接的记录;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有王事者也’的一群,负有执行政务、提出建议和应诏答问的责任,其影响朝廷决策和对言路所起的导引推动作用远甚于民间士大夫的私议。正是由于这批身居高位、关系国运的官僚们深受‘内夏外夷’传统观念的熏染,使得他们在对待外部事务上常常表现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轻侮对手的狂妄态度,制造‘外夷诚服’、‘圣恩远泽’的虚幻假象,丝毫没有防备突发事件的忧患意识,以‘水陆劲旅’、‘天朝兵威’等不着边际的自

〔1〕 林则徐:《传谕委黎多严拒英国兵船》,《林则徐集·公牍》,第188页。

大之词威慑对方，自欺欺人，从未认真考虑过一旦顿开边衅将何以战守，更未曾探求过西方的军事实力和侵略意向，完全没有加强战备的紧迫感。他们始终恪守儒家礼乐教化的一套教条，维护“夷夏之防”的传统体制，鄙视对方的一切，甚至讽刺洋人的起居饮食、衣着服饰。华夏文明的传统优越感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血肉中，以致在书写对方国名、姓名时也忘不了要加上一个“口”字，以示“夷人犬羊成性”；不可理喻，所以，米利坚被写作“咪喇哩”，英吉利写成了“噤咭喇”，仿佛不这样不足以显示对外夷的轻蔑和自己的高贵。

“天朝自大”观念是一种根植于封闭式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闭型心理。它既有无知狂大的一面，也与怯懦自卑相通，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鸦片战争的全过程看，官僚士大夫在和战问题上由自大转化为自卑的大体分界是在 1842 年 3 月奕经收复浙江三城战役的失败。在此以前，群臣言战，皇帝也基本倾向于征讨。在此以后，主战言论顿消；“议事务者，不复言兵”；^{〔1〕} 妥协论调腾播，失败主义和军事上的自卑感弥漫朝廷内外。朝内有穆彰阿战不如和的投降论，所谓“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2〕} 朝外有浙江巡抚刘韵珂的洋兵火器之精，无可抵御的唯武器论。^{〔3〕} 自主战到主和，从自大到自卑的转化条件是军事上的失败和对敌人船坚炮利的恐惧。即使是主战的官僚，由于不是在知己知彼情况下言战，所以是盲目的主战，条件一变，也就从主战转化为主和。这可以从两江总督伊里布、闽浙总督颜伯焘、扬威将军奕经乃至耆英、牛鉴等人的言论和态度转向中明显看出其变化轨迹。主和者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屈服于对手，而是本

〔1〕 《徐继畲致林树海书》。

〔2〕 夏燮：《江上议款》，《中西纪事》第 8 卷。

〔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44 卷，第 32 页。

着苟且因循的心态冀求维持现存秩序。正如魏源所指出：“自用兵以来，中外朋议，不出二端，非苟且，即虚骄。”〔1〕苟且与虚骄是自卑与自大的同义语。它们貌若相反，神则暗合，相反相成地统一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上。所以，他们彼时主战，此时主和，稍胜即骄，一败立馁，在自大与自卑相通这一点上，充分反映了官僚阶层的共同文化心理。

鸦片战争中不少官员虽然也有自大自卑之词，但仍表现了崇高的气节和伟大的情操。这是因为他们在和侵略者的斗争中已经升华到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境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对关天培、陈化成、定海三总兵和陈连陞父子等甘洒热血、以身殉国的壮举，对王鼎力主抗英、廷责穆彰阿，甚至不惜尸谏吁请起用林则徐的高尚气节，产生深深的崇敬，把他们看作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

中国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一次不大的冲击。堂堂天朝竟败在了“撮尔岛夷”手下，着实使君臣们为之一惊。但这场战争毕竟只使君臣们慑于对手的船坚炮利，中西之间还只是在器物层次上发生文化冲突。所以一时的忧患意识和战败的屈辱感很快随着和约的订立而烟消云散。拍岸的惊涛，峰回路转，化作阵阵水沫，依然是死水一泓。“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2〕君臣们仍然在自圆自足的文化心理支配下昏昏睡去。

（二）

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最积极的是士大夫群体中那些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已入仕但未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小官僚。以他们的身份、地位论，他们是这一群体的中下层人物。无权无势，但有着积极参与的热情和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士大夫本色。儒家学说

〔1〕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上。

〔2〕 《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中的“内圣外王”思想锻造了士子们的节操和入世精神，从整体上说，儒生们追求修齐治平的理想和抱负，更多地反映在这批人的身上。当事情涉及到国运民生时，这批人往往会奋不顾身、不计个人得失安危地投入其中。他们这种可贵的参与精神，早在战前的禁烟问题上已作为民间私议表现了出来，乃至战争爆发，更以自己的反侵略行动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

在对待鸦片泛滥、白银外流的问题上，民间士子和中小官僚们的私议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主张。一种是以鸦片走私最严重地区的广东士绅为代表的弛禁论。这批人以广州学海堂教习吴兰修、熊景星、仪克中等人为基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曾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皆受影响。这批民间士子亲见禁令成为一纸具文，鸦片愈禁愈多的事实，主张与其禁烟不能收到实效，不如准其入口纳税，以裕国库。1834年吴兰修写成《弭害》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弛禁主张，成为这派意见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后来，许乃济据此写成了《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变通办理折》，成为政府官员中公开倡弛解禁的标本。另一种是以京师士大夫为代表的倡禁论。这派人物据《水窗春呓》所记，有“陈石士、程春海、姚伯昂三侍郎，谏垣中则徐廉峰、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则何子贞、吴子序，中书则梅伯言、宗涤楼，公车则孔宥涵、潘四龙、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都是当代名士，而以黄爵滋为核心。他们常在陶然亭聚会，针对鸦片走私猖獗、国计民生受害的危险，发议论、赋诗词、写文章，痛加揭露和批判，倡导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形成了一股禁烟热，支配着京师的舆论。朱崧、许球受此影响和推动，首先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发难；后来，据说黄爵滋所上的《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即是他与臧纆青等“夜谈剪烛”的产物。可见，鸦片问题上禁与弛禁的争议，首先发端于士大夫的中下层，然后才从民间私议变成统治集团中的论战，而且朝廷中两派官员的带头人都受到

民间私议的影响和推动。

平心而论，不管历史作了怎样的选择，应该承认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士大夫都表现了他们关心国运民生的善良愿望，表现了参与意识和入世精神。但是，弛禁论者面对禁烟不获成效的客观事实却推导出错误的对策方针，理所当然地被历史选择所否决。他们不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和社会良知的化身，而且得到了他们所谴责的对象——外国鸦片贩子的喝彩。良好的愿望走向了反面。历史证明了只有禁烟主张才真正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些为倡导禁烟而奔走呼号的士子，为实行禁烟而在第一线身体力行的地方大员，才是真正敢于直面侵略者的斗士，做了国家的脊梁。弛禁论虽然错误，但他们中不少人同样怀有忧国忧民之心，表现了士大夫的本色。

从鸦片战争前关于禁与弛禁的民间私议中可以看出，士大夫中不少读书人和士绅，已经在爱国感情支配下，关心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了。正是这批人，当战争爆发、英军入侵时，纷纷以自己的地位和才智，利用各种形式，积极投入爱国反侵略斗争，成了民族自卫战争的中坚力量。

一种形式是领导乡民进行保家卫国的抗英战斗。著名的有何玉成、林福祥等士绅发动和领导的三元里抗英斗争，江苏宿迁举人臧纡青在家乡组织团练自发反抗侵略，鸦片战争后广东社学领导的反入城斗争。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精神，程度不等地配合了爱国官兵在正面战场中的战斗。

另一种形式是参与军事，以自己的才智为反侵略战争出谋献策，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参与扬威将军奕经幕府的臧纡青。他在收复浙江三城的战役中，向奕经提出“伏勇散战法”以对付装备精良的英军。这一建议虽然最后未被采纳，但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重要意义。范文澜称它是“朴素的人民游击战思想”；是弱国战

胜外国侵略者的有效方法”。〔1〕奕经不识货，结果浙江战役大败，臧纡青为此气瞎了一只眼睛。事后奕经拟上奏朝廷授臧官职，他坚辞不受，拂袖而去，表现了一个士子的气节和良心。

与此相近的一种情况是，更多的士子虽未参与军幕，但仍上书言兵，以自己的兵学知识和战略思想向有关将领、官员或提建议，或备顾问，表现了爱国反侵略的拳拳之心。属于这种情况的士子，人数众多。著名的有包世臣上果勇侯杨芳书，建议乘机将大角、沙角、虎门等炮台修复，以防英军再次进攻；上两江总督裕谦书，讨论加强 圖山设防，以备不虞，认为‘圖山无备，镇江扬州必无以自全，而白门（案指南京）亦非乐土矣’。〔2〕有林福祥上广东巡抚祁 埏书，建议乘英军离粤北上江浙之机，以清兵配合团练一举收复香港。指出‘香港不可不复，炮台不可不修，若祇求旦夕之安，不计存亡之理，今日尚持首鼠之端，他日必貽反噬之悔’。〔3〕词严义正，表现了收复失土的决心。有江苏士子卜起元上奕经书，针对此公一路花天酒地，指出“今日之势，不患无进剿之策，尚患无进剿之人，不患无必胜之机，特患无决胜之气”。〔4〕可谓入木三分书后又附了有关‘进剿事宜十二条’以备采择。

还有一种人，他们也参与军幕，但主要是以兵工专家的身份为反侵略战争贡献自己的特长，对改善清军武器装备，加强战斗力起了一定作用。著名的如嘉兴县丞龚振麟在宁波军营吸收西方火炮之长制成‘枢机新式炮架’，并不断改进铸炮技术 浙江炮局委员、余姚知县汪仲祥与龚振麟一起，利用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制造出安南战船和车轮战船等。

第三种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是以诗歌、散文歌颂爱国官兵的抗英斗争，表彰为国捐躯的忠勇将士，抨击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 49 页。

〔2〕 以上均见《安吴四种》第 35 卷。

〔3〕、〔4〕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 4 册，第 602、585 页。

的昏庸无能官僚，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为形成近代爱国反侵略的文学开辟了道路。著名的有张维屏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贝青乔的《咄咄吟》、谢兰生的《咏梅轩稿》、金和的《秋螭吟馆诗抄》、佚名的《镇城竹枝词》、何仁山的《草草草堂诗草》、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等诗歌作品，有夏燮《中西纪事》、谢兰生《思忠录》、范锴《花笑庵杂笔》等散文。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出于一批小知识分子之手的反侵略揭帖、檄文、告示、公启，以通俗的语言表达了群众的心声，成了反侵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著名而具代表性的有《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粤东义民布告》、《三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宁波义民公启》等，受到后世文学史家的重视和研究。

通观中下层士大夫在鸦片战争时期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可以看到他们的爱国思想具有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内涵：

第一，爱国和乡土观念相结合。许多士绅之所以举办团练、发动乡民起来抗击英军入侵，完全是在保卫家园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不难理解。一方面，英军抢掠烧杀的暴行，使东南四省人民蒙受家破人亡之苦，保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家庭和家乡紧密结合，不可分离，于是爱国感情也就与爱家乡联在一起。士绅多数又是乡村中有地位的人物，保卫家园既是乡民的要求，也是他们的首着。所以告示檄文中一再指出：“今且不用官兵，专用乡民，非我们不仁，尔害我乡村，伤我男妇，不得不与畜类同斗”，^{〔1〕}“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2〕}“惜身家亦惜土地，深怀父母之邦，保土地即保身家，欲作干城之寄”，^{〔3〕}反映的即是爱国与乡土观念相结合的内涵。

〔1〕〔2〕〔3〕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4册，第13、14、16页。

第二,爱国与忠君观念相结合。儒学纲常名教中的首纲就是“君为臣纲”,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就是君主和国家融为一体。忠君爱国成了士大夫的共识和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黄爵滋主张严禁鸦片,他的著名奏折的第一句话就是:“臣惟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且切”,表示他是在为皇帝着想。包世臣指陈英国十数年后必将为中国的大患,最后一段话是“必至以忧患贻君父,岂君子之所忍出哉?”^[1]说明国家的忧患就是君主的忧患,君与国联在一起。张维屏歌颂陈连陞、陈化成、葛云飞三将军是“捐躯报国皆忠臣”;^[2]甚至群众贴出的反英告示中也表明自己是为皇帝分忧,指斥英军侵略是“无君无父”的“猪狗”。

第三,爱国与御侮图强的愿望相结合。鸦片战争是一场“千年奇变”。中国战败使不少士大夫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促使他们反思,激发他们改革弊政以求国富兵强的爱国愿望。战后出现了许多寻求御侮图强之路的著述,如魏源为总结鸦片战争的失败教训而写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筹海篇》,为研究清朝鼎盛时期的武功以及汲取改善清军战斗力的历史经验,写了《圣武记》。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系统论证了反侵略自卫战争中战、守、和三者的辩证关系,而且提出了改革清军的调遣成法、加强海防、注意兵食、严肃军纪、师敌长技、发展民间工商业等一系列主张。姚莹为防范英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侵略,加强边防而对边疆地理进行了研究,写了《康輶纪行》一书。他在致友人信中说自己“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3]流露了御侮图强的强烈愿望。林福祥为探讨反侵略的战略战术写了《平海心筹》,对军事和政治、军事与外交、军事与民心以及埋伏守险、防守后路、修筑炮台、小船攻大船等发表了自己的

[1] 《安吴四种》第35卷。

[2] 张维屏:《松心十录·三将军歌》,《花地集》卷三。

[3] 姚莹:《复光律原书》,《东溪文后集》第8卷。

见解,认为今日之事“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务实,若既和之后,仍任其武备废弛,则祸患又安有极哉?”〔1〕批判了朝廷苟且偷安的现状。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中下层士绅爱国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中国士大夫群体在近代开端时期爱国主义的基本构成和基本水平。如果这个判断可以成立,那么由此可见近代开端时期的爱国主义既继承了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又具有以往所没有的时代特点。因为御侮图强所表现的内容是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它所寻求的强盛之路已经不再是向古代回归,而是面向新的世界。尽管当时的爱国者中大多数人还不具有这种历史眼光,但少数的先进者已经睁开了睡眼。这贵族的少数,这少数人可贵的一瞥,正是孕育着民族觉醒的可贵起点。

(三)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近代中国史,爱国反侵略是历史的主旋律,而学习西方则是伴和主旋律的重要乐章。从它提出之日起,就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大潮连在一起,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

学习西方的首创者,是被后世史家誉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近代开端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林则徐。他年轻时受过今文经学的训练,入仕后又主张经世致用,是嘉道年间地主阶级经世派的领袖人物。1839年初,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到广东主持禁烟时,像其他闭目塞听的士大夫一样,对世界一无所知,充满着天朝自大的优越感。只是在宣布禁烟决心、限令外商缴烟受到外国烟贩和英国商务监督义律阻挠后,他才逐步克服自大心态,开始了

〔1〕《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4册,第586页。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21页。

解西方的工作。他把经世派传统的‘通时务’扩展到‘通夷务’，终于使他从蒙昧无知进到追求新知的境界，从严禁鸦片到奖励通商，从盲目的天朝自大到以外夷为师法对象，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主张，成了近代开端时期的伟大爱国者和新时代新思想的启迪者。但是他在广东时的种种实践，就主要方面看还只是了解西方。只有经过魏源的概括和阐发，才成为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思想命题，并在尔后的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一个思想命题，它包含着‘师夷’和‘制夷’两个密不可分的内容“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道出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因此，并不是任何师夷长技的行为都可纳入爱国反侵略行列的。

学习西方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当时的中国比西方落后。但是，并非所有承认落后于西方的人都会赞同或主张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中不论是统治集团层面的人物，还是身历战争第一线的士大夫，全都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意识到了清军八旗绿营装备简陋，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由此作出的判断却大相径庭。一种是被敌人的坚船利炮所吓倒，以己不如人为理由力主妥协投降。1842年8月20日，清政府负责和议的全权代表、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应邀参观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舰‘康华丽’号，事后，耆英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称：“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舰，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2〕}完全屈服于敌人的武器威力。所以当8月26日最后审定条约文本时，耆英早已不敢异议，对条约“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立即表示“完全同意”。^{〔3〕}一种是囿于传统的“夷夏之防”和腐朽的天朝自大观念，不愿也不敢学习西方。1840年11月，替代林则徐的新任钦差大

〔1〕 《海国图志》百卷本，《自序》。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305页。

〔3〕 [英]利洛：《缔约日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14页。

臣琦善甫到广东,就申言:“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1〕结果,误国害民。也有另一种人,他们看到了对手的强大,也有了解对手的举动,但骨子里总有点害怕对手的恐惧症。结果仍免不了走上妥协退让的道路,刘韵珂、徐继畲即是两例。浙江巡抚刘韵珂在浙江战役失败后上了个“十可虑”折,罗列了己不如人,民心可虑等十大点,观察不能说不正确,分析也可称颇有见地,但结论却是旁敲侧击地劝说朝廷“随机应变,妥协办理”;〔2〕徐继畲在战后写了一部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的系统著作《瀛环志略》,作为近代开端时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它是杰出的;但作为睡眼方开的地方大员,徐继畲在对外交涉中奉行“息事而不致生事”〔3〕的妥协方针,则是不足取的。所以,看到了对手的强大,不必然会引出学习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结论。只有那些既具有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无所畏惧的反侵略精神,又敢于和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相抗争的人,才能提出学习西方以制服侵略的光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魏源等思想界的前驱者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的。

中国人学习西方,从内容上说经历了由地及史、由长技到西政的漫长过程。鸦片战争后一、二十年间,主张学习西方的人数虽不多,著作也有限,但涉及的方面却颇为广泛。举凡政治、法律、军事、技术、地理、历史、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无不涉猎,反映了睡眼方开,从封闭氛围中刚刚面对世界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新鲜感。那时的中国先进者,什么都想了解,什么都爱搜求,即使是一鳞半爪,只要中国所无而又自以为对除弊救世有益的,都想搬过来。但是,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人们迫切需要的,主要还是认知西方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西方的军事技术、军事生产的知识。

〔1〕《夷搜入寇记》,《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14页。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4卷,第29~33页。

〔3〕《松龛先生全集》,第61页。

所以，战后出现的为数不多的介绍西方、学习西方的著作，丛集在世界地理学和造船制炮的军事技术两方面。据统计，从林则徐在 1841 年编译《四洲志》起到 1861 年，中国人写了 22 部有关世界地理的著作。^{〔1〕}著名的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汪文泰的《红毛蕃英吉利考略》、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梁廷枏的《兰仑偶说》、《合省国说》等。这些著作或由地理旁及人文历史，或由政情风俗涉及地理形胜，无不映照出中国先进分子迫切希望认知对手乃至世界的心态。传统的“天下观”开始被突破，人们可以站在更宽广的空间上认识中国和世界了。尽管他们面前的世界还很不清，他们的观察也还浮浅，但却标志着中国人自此冲出了塞听闭目的混沌状态，开始面向一个新而又陌生的世界。

鸦片战争中给中国人印象最深、压迫感最强烈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因此，强调学习西方最主要的呼声是对手的“长技”据有人统计，在 1821~1861 年间，至少有 66 人赞成中国必须学习和仿制西方的兵船火炮，其中包括皇帝、大臣和民间学者、公行商人及熟悉火器的民工专家。^{〔2〕}从 1840~1860 年，中国出版了有关西方枪炮、地雷、炸弹、黑色火药等内容的 22 种著作和大约十余种介绍西方军舰制造方面的书籍。^{〔3〕}

这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还只是看到“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还没有超越器物层次及于政治制度。他们学习西方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去寻求西方的真理，而是为了补封建制度的窟窿才把眼睛移向西方。所以就当时学习西方的内容与目的来说，还跳不出“御侮图强”、“救世除弊”的需要。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在地主阶级改革家的方面。把他们说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前驱，显然是脱

〔1〕〔2〕〔3〕 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 172、173、174 页。

离了当时的社会存在，也脱离了他们的思想实际。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前辈改革家已经不同，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与前贤们不同的时代特点：他们已经不再从封建古文化中寻求救世的药方，而是睁眼看世界，从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中寻找补天之石。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把视野转向西方时，他们在客观上也就成了旧制度的拆庙者。补天与拆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扭结在一起，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处在复杂而又矛盾的境地。从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中既可找到大量旧时代的东西，又可以发现符合新时代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近代开端时期中西文化最初交汇时先进思想家所共有的特点。

必须指出，学习西方在鸦片战争后一二十年间并没有成为全社会思潮。这是为什么？原因种种，若就思潮本身而言，则涉及到社会思潮形成的层面效应问题。大凡一种思潮的形成，它的前驱者的思想主张必须通过士绅们的感应与拨动，才能传递到社会底层，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考察战后十余年间的思想变化轨迹，恰恰是在至关重要的中间环节上没有形成波及全国的传递层面，致使向西方学习的先进思想未能发育为社会思潮。结果，统治者昏昏睡去，前驱者们自己也在孤寂中不复再有振聋发聩之声。中国丧失了将近二十年的宝贵时间。

总之，中国士大夫在历史的大变动时刻，虽然各个层面乃至每个个体表现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无愧为当时社会最先进的一群，对历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以崇高的爱国之情、不屈的反侵略斗争，迎来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同时，他们也将在这个新时代中发生层层蜕变，否定自己，在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改造中成为新阶级的一翼。